

略论超自然观念对中国人归因的影响

卢云峰 陈 朗 吴胜涛^①

内容提要：归因是我们理解世界、生成意义的重要方式。主流理论以“集体主义”文化为焦点，忽视了社会认知的动态复杂性与超自然观念的影响。超自然观念对中国人归因的影响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归因对象、归因维度、归因过程和归因后果。中国人有家族和国家等非个体的独特归因对象；超自然观念提供了“个人-情境”二分法之外的重要归因维度；中国人存在“自动情境纠正”的归因过程，其根源在于基于阴阳观的关联与整体思维，后者还对宏观社会发展产生影响。

关键词：超自然观念 中国人归因 阴阳观 命运观

作者简介：卢云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朗，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吴胜涛，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一、引言

归因理论的奠基者是海德尔（Heider）。1958年，他首次提出“归因理论”和“常识心理学”的说法。海德尔认为，人类都是直观的心理学家，他们试图去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并通过推理来确定自己和他人行为的原因。“原因”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个人因素，如能力和努力等；第二类是情境因素，如任务难度和运气等。^① 尽管归因研究已发展出众多不同的理论，但是海德尔所奠定的框架仍是基石。

于中国人而言，超自然观念对个体的思想、行为存在巨大影响。在归因研究领域，成就归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而中国人对成就进行归因时，往往离不开超自然观念。我国有句顺口溜来概括影响成功的要素：“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鬼神，九交贵人十养生”，这些因素多数与超自然观念有关。时至今日，中国人仍然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20年的数据显示，仍有相当比例的中国人持有一定的超自然观念信仰，尤其是“祖先”（57%）、“命”（50%）、“风水”（47%）、“佛或菩萨”（28%）、“神仙”（15%）、“鬼”（10%）等信仰。

虽然超自然观念在当今社会仍然普遍存在，但是鲜有研究关注它们对中国人归因的影响。如前所述，现有的关于中国人归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人归因（Dispositional Attribution）”和“情境归因（Situational Attribution）”上，即“内-外”归因研究，以“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为核心的文化差异是解释中西归因差异的主流范式。^② 少数研究对于中国的诸种超自然观念有一定的讨论，如缘^③、无我^④等，这些研究注意到了中国人的

^① Heider, Fritz,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London: Psychology Press, 1958.

^② 例如 Morris, Michael W. and Kaiping Peng, “Culture and Cause: American and Chinese Attributions for Social and Physical Ev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67, no. 6, 1994, pp. 949-971.

^③ 杨国枢：《中国人之缘的观念与功能》，载杨国枢等编《中国人的心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④ Huang, Tsung-Ren and Yi-Hao Wang, “Perceiving Self, Others, and Events Through a Religious Lens: Mahayana Buddhists vs. Christian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vol. 10, 2019, pp. 1-7.

归因受到了超自然观念的影响。还有一些研究谈到了印度教中的业报^①、宿命论^②等观念对于归因的影响,这些超自然观念在中国同样存在,但是由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与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背景,业报、宿命论等观念的表现形式及其对归因的影响可能存在不同,这些研究结论是否能延伸到中国有待进一步研究。超自然观念对中国人的归因具有重要影响,但这一研究领域尚处于发轫阶段,本文拟在对既有研究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勾勒出超自然观念对于中国人的归因产生影响的各種路径,并为未来的中国人归因研究提供一个框架。

二、归因对象

在经典归因研究之中,归因对象主要集中在对事件发生原因的分析上,研究者称之为事理归因(Causal Attribution),即试图解释为什么某件事会发生。^③这种归因关注外部环境、内部动机等因素^④,有助于个体对事件的深入理解,从而更好地应对和预测未来的类似事件。

对于不同的文化而言,能动性的内隐理论(Implicit Theories of Agency)存在显著的区别,西方人倾向于将个人视为自由的能动者,而东亚人则倾向于将个人视为受约束的能动者,并且更强调群体或集体的能动性。^⑤虽然内隐理论的文化差异已经被观察到,但现有研究很少将这一点运用于对归因对象的反思与扩展上,对于个体之外的其他层次对象进行的归因研究仍然不受重视。

受到个人主义的影响,西方的归因研究常常以个体为本位^⑥,很少注意到个体之外的因素存在很强的异质性,群体(Group)的概念并不足对所有的非个体因素进行概括。对于中国人而言,个人、家族、国家等都是重要的主体,并且都具备相当的能动性。

在个体层面,民间盛行的“通书”(常见以“老黄历”)上所记载的“行事宜忌”体现了中国人对于重要生命事件的主观判断,这些事件与西方人所认识的重要事件存在区别。“通书”或“皇历”是以历法为基础、用以指导民众的生活与生产的手册。以明代最为流行的通书之一《便民图纂》为例,《便民图纂》记载了民众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方面,并在“涓吉篇”中以星宿神煞阴阳术法则推究人事的吉凶祸福,以此指导人们的行为,包括入学、赴举、嫁娶、安葬、求嗣、求财、出行等内容。^⑦这些内容反映了民众观念中最为重要的事件,时至今日,在各种版本的“老黄历”中,仍然可以找到上述事件的身影。

在家族与国家层面,家族与国家的兴衰也是归因的重要对象,“风水”被运用于解释家族的兴衰,“五行”被运用于解释王朝的更替。“风水”和“五行”理论都建立在“阴阳”的基

① Young, Maia J. et al, “Deity and Destiny.”,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vol. 42, no. 6, 2011, pp. 1030–1053.

② Norenzayan, Ara and Albert Lee, “It Was Meant to Happen: Explaining Cultural Variations in Fate Attribu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98, no. 5, 2010, pp. 702–720.

③ Kelley, H. H., “Attribution theory in social psychology”, in D. Levine, ed.,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7, pp. 192–238.

④ Weiner, B., “An attributional theory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emo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92, no. 4, 1985, p. 548.

⑤ Menon, Tanya et al, “Culture and the Construal of Agency: Attribution to Individual versus Group Disposi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76, no. 5, 1999, pp. 701–717; Morris, Michael W. et al, “Culturally Conferred Conceptions of Agency: A Key to Social Perception of Persons, Groups, and Other Actor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 5, no. 2, 2001, pp. 169–182.

⑥ 杜林致、乐国安:《西方归因理论的文化反思》,《心理学进展》2011年第1期。

⑦ 邝璠:《便民通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页。

础之上。“风水”注重考察自然环境，顺应自然，臻向天时、地利、人和诸吉咸备，以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①，“风水”的好坏与家族的兴衰存在直接的关联^②；“五行”理论认为朝代的历史变化是五行相生相克的结果，试图在自然力量的运动与人类事件之间建立广泛的联系^③。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家族与王朝的命运同样重要并且需要解释。

当研究者关注中国人的归因方式时，首先要注意中国人归因对象的独特性，中国人存在一些与西方人不同的归因对象，家族与国家的发展同样至关重要。

三、归因维度

归因维度指的是当个人进行归因时可能存在的原因及其分类方式。最经典的原因分类是由海德提出的“个人”和“情境”二分法。在推理行为的原因时，人们常常从两个维度来进行：个人（Person）维度，如人格、情绪、能力和努力等；情境（Situation）维度，如环境、运气、工作性质等。个人维度即内部因素，环境维度即外部因素。作为归因理论的开创者，海德尔的内外归因二分法奠定了原因维度的分类模式，尽管后来的理论和研究存在对于该二分法的反思与批评，但总体上仍延续着这一分类标准。

在“个人－情境”二分法的基础上，韦纳（Weiner）扩展了对于原因维度的讨论，认为可以依照三个维度对不同的原因进行划分：“位置（Locus）”“稳定性（Stability）”“可控性（Controllability）”。^④“位置”指的是原因的来源，根据原因是否来自于个体自身，可以将原因分为“内部原因”与“外部原因”，前者指个体自身的特质，后者指个体之外的因素。“稳定性”指的是原因是否稳定；不容易变化的原因具备更高的稳定性，反之则稳定性差。“可控性”指的是原因是否可以加以控制与改变，凡是个体可干预的都是可控的原因，凡是个体无法干预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原因就是不可控的原因。

尽管归因理论对于归因维度进行了丰富地建构与拓展，但在具体的中国人归因研究或归因的文化比较之中，“内在－外在”的框架仍然被保留了下来。现有研究支持中国人（或东亚人）更多地倾向于“情境归因”（外归因），而西方人则更倾向于“个人归因”（内归因）。这一研究结论体现了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假设，运用这一理论框架检视中国人的归因维度很容易忽视中国人归因的核心特征。^⑤首先，基于“个人－情境”二分法的“内在－外在”框架实际上以个体为本位，情境就是个体之外的一切因素。其次，将个人之外因素全部归为情境的作法体现了西方社会的理性主义特点，外部因素存在理性的方面（如任务难度），但往往也存在非理性的方面（如上帝、宿命等）。在经历了漫长且全面的理性化进程之后，西方社会存在极强的“祛魅”色彩，人们相信事物的原因是可以被理性认识的，从而将非理性的因素排除出了科学研究。

中国的现实与思想传统表明，个人与情境或外部世界从来不是二分的，个人嵌套在一个被关系支配的从个人到天下的结构之中，超自然观念在其中存在广泛的影响。以“个人归因”和“情境归因”作为文化比较的基础是不稳固的。

① 王其亨、张慧：《〈尚书〉、〈周礼〉——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与风水理论的坟典》，《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② 林耀华：《金翼：中国家庭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庄孔韶、林宗成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5页。

③ Wang, Robin R., *Yinyang: The Way of Heaven and Earth in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④ 韦纳：《动机和情绪的归因理论》，林钟敏译，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79页。

⑤ 杜林致、乐国安：《西方归因理论的文化反思》，《心理学进展》2011年第1期。

首先，中国人不以作为独立实体的个体为本位，中国的“个人－情境”关系更加复杂，个人和情境难以区分开来。^① 中国的儒释道哲学传统强调世界中对立事物的共存和元素的相互依赖，即辩证思维，因此中国人在理解现象时注重对事物的动态和复杂性的认识，接受矛盾、变化和相互依赖的复杂关系，如家族取向、关系取向和阴阳观念等。^② 因此，在中国文化下，个人与社会情境之间往往相互构成且密不可分的。“家族取向”意味着中国人认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族或家庭，而非个人，家族是中国人社会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个人在“家”中成为个人，其所面临的主要外部环境仍然是“家”，个体与环境统合于作为基本单位的家族，而非彼此对立分离。在此意义上，中国人是“一体本位”而非“个体本位”的，所谓“一体”指的是以父母为本、“父子一体”或“母子一体”的家国同构的结构。^③ “关系取向”意味着中国人在社会关系之中定义自我，个体之间高度互依，关系的和谐是中国人的重要追求^④，因而，个体与环境的关系比独立的个体或环境更为重要。“阴阳”的思维模式^⑤ 也存在重要影响，“阴阳”观念认为事物的特质只有在特定环境下才有意义，个人只有被置于特定的环境内才真正具备意义。

其次，超自然观念对于中国人原因维度的划分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 CFPS 的调查结果，在评价影响个人成就的各种因素时，有信仰者与无信仰者在对自致性和先赋性的看法并无显著差异，但是，有信仰者更认可运气和家庭关系对成就的作用^⑥。“运”是中国超自然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命运观的核心概念，“运”的观念包含了非宗教的随机性的部分，也包含了一些超自然力量。这表明，超自然观念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原因维度，如“运”“风水”等，这样一些维度常见于民间，例如，在《金翼》一书中，林耀华发现民众总是将家族的成败兴衰归因于“风水”^⑦。对于传统中国的民众而言，“风水”远比个人的努力更能决定家族的命运，时至今日，相信“风水”的民众仍不在少数。

因此，中国人的归因很难以“个人－情境”的二分法进行概括。在超自然观念（如阴阳观）的影响之下，中国人观念之中的个人及情境并非截然二分的对立面，并且，在内因和外因之外，超自然观念提供了一些其他的原因维度。

四、归因过程

所谓“归因过程”，指的是个人在进行归因时自发产生的一系列认知处理过程。既有研究发现，归因可进一步区分为归因内容与归因过程两个方面，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归因内容而非归因过程上，存在一种跨文化的、普遍的归因过程，但这一模式所承载的具体内容可能

① Choi, I. et al. “Causal Attribution across Cultures: Variation and Universalit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25, no. 1, 1999, pp.47-63.

② Nisbett, R. E. and Masuda, T., “Culture and point of view.”,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100, no. 19, 2003, pp. 11163-11170; Peng, K. and Nisbett, R. E., “Culture, dialectics, and reasoning about contradic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54, no. 9, 1999, pp. 741-1284.

③ 周飞舟：《一本与一体：中国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2021 年第 4 期。

④ 杨国枢：《华人社会取向的理论分析》，载杨国枢等编《华人本土心理学》，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⑤ Wang, Robin R., *Yinyang: The Way of Heaven and Earth in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⑥ 张春泥等：《信仰与观念》，载《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20—2021》（即将出版）。

⑦ 林耀华：《金翼：中国家庭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庄孔韶、林宗成译，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第 5 页。

具备文化特异性。^① 因此，关于归因过程的研究试图讨论：归因内容的差异是在归因过程的哪些方面体现的？

“双重过程理论 (Dual Processes Theory)” 是解释中西归因差异的主流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的认知系统中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加工过程：“一类过程 (Type 1 process)” 和“二类过程 (Type 2 process)”，一类过程是“直觉性的 (intuitive)”、自动的，不需要“工作记忆 (Work Memory)”，而二类过程是“反思性的 (reflective)”，伴随着“认知解耦 (Cognitive Decoupling)” 和“心理模拟 (Mental Simulation)” 的过程，需要“工作记忆”。^② 简而言之，一类过程是自动完成的、难以意识到的认知过程，而二类过程则是有意地进行的，更具主动性。

“双重过程理论” 往往与“两阶段理论 (Two Stages Theory)” 联系在一起。“两阶段理论” 强调，人的感知包括 (至少) 两个功能不同的推理阶段：“锚定 (Anchoring)” 阶段与“纠正 (Correction)” 或“调整 (Adjustment)” 阶段，这两个阶段串联在一起，只有在第一阶段完成后，才能进行第二阶段的工作。^③

在这一背景下，“双重过程理论” 对于中西归因差异的解释可以总结为：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归因差异可能出现在自动纠正阶段 (第二阶段，但纠正工作是自动的、直觉的一类过程) 中——中国人与西方人存在相似的自动“个人归因” 锚定倾向，但是这种倾向被同样自动的“情境纠正” 所调节了，因此中国人呈现出了更加偏向“情境归因” 的特点。^④ 也即是说，中西的归因差异可能根源于深层的认知与文化差异，在直觉的和自动化的一类过程中，存在着感知的文化特异性，这种文化特异性以中国人自动的情境纠正表现出来。^⑤

为了解释上述归因过程的文化差异，研究者们诉诸文化比较——不同的文化存在不同的因果关系模型，进而导致不同文化下个人的因果图示与归因过程存在区别。尼斯贝特 (Richard E. Nisbett) 等人认为，中西归因过程的差异根源于思维系统或思维模式的区别：中国人 (东亚人) 的思维模式是“整体性的 (Holistic)”，这一思维关注并赋予整体领域以因果关系，较少使用类别和形式逻辑，并依赖“辩证” 推理；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更偏向于“分析性 (Analytic)”，这一思维主要关注对象及其所属的类别，并试图使用规则 (如形式逻辑) 来理解行为。^⑥ 这两种思维差异根源于形而上学体系、认识论以及社会系统之中，尼斯贝特等人将“儒家文化” 视为中国整体性思维的源头 (尤其是“和” 的观念)，将“古希腊文化”

① 韦纳：《归因动机论》，周玉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第 59 页。

② Evans, Jonathan and Keith E. Stanovich. “Dual-Process Theories of Higher Cognition.” ,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8, no. 3, 2013, pp.223-241.

③ Gilbert, D. T. and Malone, P. S. “The correspondence bias.” ,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17, 1995, pp.21-38.

④ Knowles, Eric D. et al. “Culture and the Process of Person Perception: Evidence for Automaticity among East Asians in Correcting for Situational Influences on Behavior.” ,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27, no. 10, 2001, pp. 1344-1356; Krull, Douglas S. and Michael W Morris,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Causal Attribution” , in *Encyclopedia of Cognitive Science*, John Wiley & Sons, Ltd, 2006, pp. 1-4; Mason, Malia F. and Michael W. Morris, “Culture, Attribution and Automaticity: A Soci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 View.” ,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vol. 5, no. 2-3, 2010, pp. 292-306.

⑤ Knowles, Eric D. et al. “Culture and the Process of Person Perception: Evidence for Automaticity among East Asians in Correcting for Situational Influences on Behavior.” ,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27, no. 10, 2001, pp. 1344-1356; Yama, Hiroshi et al, “A Dual Process Model for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ought.” , *Mind & Society*, vol. 6, no. 2, 2007, pp. 143-172.

⑥ Nisbett, Richard E. et al, “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 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Cognition.” ,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108, no. 2, 2001, pp. 291-310.

视为西方分析性思维的根源（尤其是“个人能动性”的观念）。

在区分了“整体性”和“分析性”两种思维模式之后，尼斯贝特等人认为，不同的思维模式与不同类型的因果关系模型联系在一起，中国人（东亚人）的因果关系模型是“互动的（Interactional）”，而西方人的因果关系模型是“个人的（Dispositional）”。中国人对宇宙有整体性的假设，宇宙中的每一个元素都以某种方式相互关联，不能脱离整体来对一个事物进行理解；相反，西方人认为宇宙由原子组成，这些原子彼此分离、相互独立。因此，中国人拥有更为复杂的因果图式，在归因过程之中会将更多的信息量纳入考虑，这使得中国人存在更多的情境归因。^①

上述归因过程的文化比较工作已经相当深入，但是，研究结论却忽视了超自然观念的重要影响，尼斯贝特等人所提出的“互动的”因果关系模型以及“整体的”宇宙论假设实际上已经触及了中国文化的核心——阴阳观。阴阳观念恰恰是上述中国思维模式与因果关系模型形成的关键条件。

整体主义世界观与“关联性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常被视为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特点，这一思维方式的核心就是“阴阳”观念。^② 与西方常见的分析性思维不同，“阴阳”的关联性思维是围绕着“阳”和“阴”的对偶形成的，世间万物都围绕着这一对偶进行排列，并形成了一个二元对立的链条。“阳（A）-阴（B）”的对偶可以串联起诸如“天-地”“主-臣”等不同的二元对立结构，在所有的二元对立结构中，“阳（A）”的一端都高于“阴（B）”的一端，但两者并没有发展出“好-坏”的结构，并且两端总是相互依存。^③ 不仅如此，“阴阳”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阴阳”不是作为实体而是作为动态关系而存在，阴阳思维强调事物必须被置于特定环境下才能进行分析。因此，阴阳思维实际上是一种“三”的思维，“阴阳”的动态关系构成了“生”，阴阳思维追求的是平衡与和谐。^④ 这样一种阴阳思维所带来的关联性思维强调对于外部世界的整体把握，并试图用“阴阳”的相关性来把握与万物的联系。“阴阳五行”学说被广泛地运用于伦理学说、政治与历史解释、中医、音乐等不同的领域，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⑤

既有研究对于超自然观念的忽视，核心原因在于研究对象的局限性——研究者以中国社会的主要学说（儒家学说）作为中国思维模式的核心，往往忽略了中国其他观念系统的存在，这些观念系统不依附于任何一个独立的宗教或学说存在，但却对中国社会具有普遍的影响，如广泛存在的“阴阳”与“命运”等超自然观念。中国的宗教或学说以儒释道三家为核心，但它们建立在广大的民间信仰的基础上，儒释道三家的学说是彼此交融的，“混合性（Diffused）”而非“独立性（Institutional）”才是中国宗教的核心特征。^⑥ 隐藏在混合宗教

① Choi, I. et al. "Culture and Judgement of Causal Relevance." ,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84, no. 1, 2003, pp.46-59; Li, Yaoran et al,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Revaluative Attributions." ,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vol. 47, no. 1, 2016, pp. 149-166.

② 葛瑞汉：《阴阳与关联思维的本质》，载艾兰等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史华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3页。

③ 葛瑞汉：《阴阳与关联思维的本质》，载艾兰等编《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④ Wang, Robin R., *Yinyang: The Way of Heaven and Earth in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⑤ 卞芷人：《阴阳五行及其体系》，文津出版社1998年。

⑥ Zürcher E., "Buddhist influence on early Taoism: A survey of scriptural evidence." , *T'oung Pao*, vol. 66, no. 1, 1980, pp. 84-147;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范丽珠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页；卢云峰：《论“混合宗教”与“独立宗教”——兼论〈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之经典性》，《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2期。

之下的超自然观念系统对中国社会有深远的影响力，它如同一个天幕笼罩着中国社会，与儒家等思想与宗教若即若离。

以主要学说或宗教作为典型对象进行分析的方法，根源于西方社会的基本特点：西方宗教具备极强的独立性与制度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西方社会的往往是少数的主流宗教或思想。因此，在理性化与政教分离的进程发生之后，宗教对于社会的影响减弱。^① 这一现实直接影响了西方的归因研究：首先，由于宗教系统的独立性与制度性，西方人在考虑宗教对于归因的影响时往往只考虑“上帝（God）”（及作为其反面的“撒旦（Satan）”）这一个观念，很少考虑独立于基督教的其他超自然观念^②；其次，由于理性化与政教分离的推进，宗教对主流社会的影响力减弱，至少在西欧如此，因此，主流的归因研究根本没有将宗教视为影响归因的关键变量，更不必谈隐藏在宗教背后的超自然观念。

就中国而言，超自然观念对于归因过程的影响仍待探索，“阴阳观”和“宿命论”等超自然观念不仅仅是关于世界的看法，更是一套认知模式与思维结构。

五、归因后果

归因是人类在社会环境中构建因果关系的方式，通过影响我们对事物的理解和评价，进一步塑造我们对社会环境中的秩序和意义的感知，因此，归因必然对其他心理行为和社会过程产生重要影响。^③ 现有研究较为关注归因的个体心理与微观人际后果，^④ 但很少关注到：（1）超自然观念对归因后果的影响；（2）超自然观念对于归因后果的影响除了在个体心理与微观人际方面有所体现，也可以表现为“社会后果”。

首先，超自然观念（如“缘”和“宿命能动观”）对归因后果存在影响。杨国枢认为，传统中国人将“缘”视为一种先定的力量，这种力量主要对人际关系产生影响，在两个个体互动的初始阶段，“缘”的观念起到了催化的作用——如果个体产生了“有缘”的感觉，那么个体间关系就会迅速推进，相反，如果个体产生了“无缘”的感觉，那么个体就会很快放弃建立关系的尝试，从而使得个体互动终止。^⑤ “宿命能动观”是中国宿命论体系的一个部分，中国人的宿命论与消极悲观的情绪后果没有直接的联系。在西方的经典研究之中，将失败归因于外在的、不可控因素的归因者常常会产生无助、悲观等负面情绪，但这一结论在中国存在差异。^⑥

其次，现有研究很少意识到归因作为一种普遍的观念或认知过程可以对文化或社会发展产生更深远的影响，从而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后果，如归因的“自证预言”效应。“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指的是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或者判断会对事件的结果产生重

① Grace Davie,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A Critical Agenda*, 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13.

② 例如 Ritzema, Robert J., “Attribution to Supernatural Causation: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Religious Commitment?”,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vol. 7, no. 4, 1979, pp. 286–293; Lupfer, Michael B. et al., “The Use of Secular and Religious Attributions to Explain Everyday Behavior.”,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vol. 31, no. 4, 1992, pp. 486–503; White, Cindel J. M. et al., “Cognitive Pathways to Belief in Karma and Belief in God.”, *Cognitive Science*, vol. 45, no. 1, 2021.

③ Weiner, B., “An attributional theory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emo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92, no. 4, 1985, pp. 548.

④ Kelley, Harold H. and John L. Michela. “Attribu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31, no. 1, 1980, pp. 457–501; Harvey, J. H. and G. Weary. “Current Issues in Attribu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35, no. 1, 1984, pp. 427–459.

⑤ 杨国枢：《中国人之缘的观念与功能》，载杨国枢等编《中国人的心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⑥ 杜林致：《归因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第 189—190 页。

要影响，无论这一观念或判断正确与否。归因就是一种先于事件的观念或判断。以《推背图》为例，《推背图》以易学为基础，以甲子、八宫、后天八卦等工具为核心推演了天命、国命与人命，其中天命为历史的主导力量。^① 这样一种历史宿命论的预言给予了乱世民众极大的心理慰藉，民众期待着新的“天命”之子的到来，相信乱世在不久的将来即将结束；唐朝的建立就是一个例子。通过提供改朝换代的社会预期，预言书能够提高了民众的参与意愿，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实现社会层面的“自证预言”效应。

综上所述，超自然观念对于归因后果的影响非常复杂，超自然观念不仅可以影响微观心理后果与人际互动，还可以产生的宏观社会后果。对于中国人而言，超自然力量不仅仅可以影响个人的遭遇，还可以对家族、王朝（国家）的兴衰产生影响。

六、结论

在以往对归因的研究中，超自然观念被严重忽略。本文发现，超自然观念对中国人的归因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归因对象方面，中国人的超自然归因的对象远不止个体，而且延伸到家族和王朝。在归因维度上，“个体－情境”二分法基本是在世俗归因的范畴内，中国普遍存在的超自然归因（命、运、风水等）无法用这种二分法加以归类。在归因过程方面，基于阴阳观的关联与整体思维会使中国人在归因过程中进行“自动情境纠正”，阴阳观和宿命论，而非特定的某一家（儒、道、佛等）对中国人的思维有着基础性的影响。最后，这些观念会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比如谶纬在社会层面所发挥的自证预言效应。当然，本文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尝试，期待未来有更多的经验研究来拓展这一领域。

（责任编辑 周广荣）

① 苗元一：《中国历史宿命论研究：推背学概论》，岳麓书社 2011 年，第 55 页。